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风云实录

主 编 苏东海 方孔木
副主编 林谷良 田百春

下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

下

主 编 苏东海 方孔木
副主编 林谷良 田百春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67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

△ 《红旗》杂志第 1 期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除批判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外，还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研人员，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可以到北京进行串连，但每批不得超过总人数的 10%，在北京停留的期限为 15 天。

△ 彭德怀在被监护中致信毛泽东，说明自己已于 12 月 27 日被红卫兵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2 日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通告，宣布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取消这个通告。

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规定：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

△ 上海《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向报社夺权。4 日，“造反总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

△ 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家，强令刘少奇、王光美站到走廊上接受批斗。

4 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鼓动打倒陶铸。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康生、江青也讲了话，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随即，陶铸、王任重被突然打倒。

△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突然打倒。康生宣布，刘志坚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5 日，全军文革小组被查封。

5 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斗陶铸的造反派，就陶铸的问题说：“我必须向主席请示，而且要经过党中央讨论。”7 日，周恩来在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又说：“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 毛泽东发出指示：如果群众要问贺龙是好人还是坏人，可以这样回答：贺龙跟我打了几十年仗。你们有什么材料可以送给中央，但是不准揪斗，不准抄家。

△ 上海《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向报社夺权。6 日，“联合司令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

△ 全国各地在京职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

6 日 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联合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散发不再承认曹获秋是上海市市长的通令，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

△ 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 16 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大会”。

8 日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在省委被冲垮、军区受冲击的情况下悲愤自杀。他在临终前给他的夫人王腾波留下遗书说：“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 毛泽东就《文汇报》、《解放日报》被夺权问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同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央宣传组，王力任组长。

△ 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策划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该机构取代了上海市政府。此后，上海掀起接管风。

△ 林彪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会议上宣布，关锋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9 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编者按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

△ 上海“工总司”等 32 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紧急通告》，以反对经济主义为名攻击中共上海市委。

10 日 戚本禹在江青的唆使下，策动造反派打倒朱德。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头头说：朱德是反毛主席的“黑司令、大军阀”，可以贴大字报揭发，到全国妇联点火。当晚，造反派围攻了朱德的夫人康克

清。11日,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大街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 关锋等人根据《五·一六通知》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宣传要点》经江青看过,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 北京新华书店的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焚烧刘少奇、邓小平像,并向全国各新华书店发出烧毁刘少奇、邓小平像的呼吁。

△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朝阳号”在江南造船厂建成下水。

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字是由毛泽东添写的,这是它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保护银行问题的通知》。

△ 中央军委发出全军文革小组改组的通知。组长为徐向前,顾问为江青。副组长有: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和谷岩、张涛。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宣布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当地节目,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辛兵、红雨的文章,并配发编者按。编者按指责蔡若虹、华君武是“长期隐藏在美术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诬蔑美术家协会是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公开提出“砸烂美协”的口号。

12日 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授意,怂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当晚,秘书局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住处,揪斗、围攻了他们。

△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强调严惩“现行反革命分子”。

△ 刘少奇向毛泽东提请辞职。深夜,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毛泽东,郑重提出:(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

出来;(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毛泽东沉吟不语,未予接受。

△ 《解放军报》社肖力(即李讷)等八人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攻击报社主要领导人。随后,报社主要领导人被打倒。17日,林彪写信支持“革命造反突击队”。

△ 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上空击落入侵的美制国民党军队F-104型战斗机一架,中共中央军委颁令嘉奖。

14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社论说:“要乘风破浪,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个一个地揪出来,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人民日报》15日转载。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规定:决不准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

△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

15日 中央军委发出《重申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通知》重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

△ 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不堪凌辱,携带夫人王慕理和儿子、女儿从广州出走。

1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 海军造反派揪斗海军政委苏振华,并查抄苏振华的家。18日,海军党委召开常委会议,确定由李作鹏主持海军党委工作。

△ 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应云卫因遭受政治迫害而逝世,终年63岁。

17日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通知》还要求:“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

18日 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出通知,规定在国外的留学生,除科技进修生有特殊需要或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在国外继续学习以外,都要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 北京市 30 多个单位的造反派进驻中共北京市委大楼，向中共北京市委夺权。

1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规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歌颂《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并说：“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

△ 林彪致信毛泽东，他说：“昨今两日中央文革同志提出关于肖华是否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问题，如果不能担任则由谁继任这一问题，我转请主席考虑和指示”。20 日，毛泽东复信表示：“应有一段时间考察一下，并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思索和检讨的机会”。

19 日至 20 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严厉斥责了江青、张春桥等人搞乱军队的阴谋，强调军队内部要团结。叶剑英拍案讲话，盛怒之下，将右手掌骨震裂了。

2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湖南省“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省军区抓人打人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系统不许接管”。并宣布，“红旗军是反动组织”。

△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载重 1500 吨的重型平板挂车。

21 日 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派解放军支持“左派”造反。

△ 中央党校“红战团”、清华大学“井冈山”等红卫兵组织成立“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起反康生斗争，遭到陈伯达批评。

△ 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被迫害致死，终年 56 岁。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号召“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自下而上地夺权”。

△ 广东省的造反组织“省革联”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夺权。这次夺权因未实行“大联合”和“三结合”没有得到中央批准。

△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终年 59 岁。

23 日 林彪在接见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全体成员时讲话。他诬蔑说：“西南的李井泉，西北的刘澜涛，还有薄一波，这些是大牛鬼蛇神。”又说：“所有右派掌权的地方，统统要夺过来。政权必须掌握在左派手里。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

24 日 国务院外事系统造反派召开批判陈毅大会，陈毅在会上被迫作检讨。周恩来、陈伯达在会上讲话，肯定了陈毅所作的检讨。

△ 上海市红卫兵在外滩、南京路等处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 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发起“炮打张春桥”运动。

2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山西省造反派的夺权。同时全文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 月 14 日的夺权《通告》。

△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通知》，宣布：“自 1967 年元月 25 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该“造反总指挥部”由 40 个造反团体组成。

△ 卜大华等 100 多名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以前加入“红卫兵”组织的青年学生，陆续被捕入狱。他们以发表演讲、张贴大字报等形式进行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受到迫害。

26 日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武装部门与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造成流血事件。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石河子事件联名发出指示。规定：“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

△ 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苏联统治集团 25 日出动军警和便衣特务，围攻毒打向列宁和斯大林陵墓敬献花圈的中国留欧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同日，周恩来、陈毅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对受伤学生表示慰问。

△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27 日 中共中央在党内公布了华北局 1966 年 7 月 27 日《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强加给乌兰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

△ 谢富治在公安部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昨天毛主席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主席支持接管。”

28 日 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要求军队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命令是以林彪的意见为基础写成、经毛泽东批准发出的。

△ 中央军委发出《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

批进行的指示》。指示规定：“处于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把自己稳定起来，以便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

△ 上海市“红革会”的红卫兵在上海友谊宫北大厅面对面地与张春桥、姚文元进行6个小时的斗争，批判他们在造反派间施展阴谋诡计，向他们提出种种质问。29日，“红革会”等联合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并准备召集全市性批判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支持张春桥、姚文元。

29日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中自杀身亡。

△ 国务院发出通知：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

30日 毛泽东在谭震林关于农业系统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31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潘复生、汪家道。大会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夺取党政财文等项大权。

△ 《人民日报》提前发表《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认为“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开创了新纪元”。

本月 戚本禹在接见中国人民大学两派组织负责人时煽动反对朱德。他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曾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搞孙泱的问题，可以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随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和北京市的大街上，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上海市掀起夺权风暴 上海市“工总司”等造反组织打垮“赤卫队”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上海市委，掀起一场大规模夺权风暴。

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找到“机联站”负责人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头头们谈话，策动夺权。

5日，“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上联名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严厉指责“赤卫队”队员破坏生产、阻滞交通，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将张春桥、姚文

元、王洪文等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的罪行推给“赤卫队”。同日，张春桥在“工总司”头头们召开的会议上讲话，鼓动夺权。他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6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几百名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主要内容是：“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获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8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肯定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认为“可以转载、广播”。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当场写成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请毛泽东审定。

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配发编者按。编者按说：“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编者按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相继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等，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随后，各造反派组织冲上街头，夺取上海市每一个工厂、企业，每一家商店、旅馆，造反派之间也展开激烈的争夺。

9日，“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紧急通告》，集中地突出地反对当时正在盛行的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滥发各种补助费、强占公房等经济主义现象。经济主义是江青等人鼓动提倡的，《紧急通告》却把它说成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并作出九项规定，“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同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根据毛泽东意见写成的综合报道《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进一步鼓动夺权。

毛泽东肯定了《紧急通告》。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贺电说：“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贺电实际上批准了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上海夺权，并将夺权推向全国。

12日，上海市召开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14日，上海市造反派押着陈丕显、曹荻秋游街“示众”。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19日，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把上海的夺权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比，说可以叫作“一月革命”，新的全市政权机构可以叫“新上海公社”。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两报一刊号召“夺权” 1月16日，《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号召夺权。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文章赞扬了上海的夺权经验，认为：“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审定的，它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发出夺权的号召。

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更加明确地要求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社论认为：“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

大事。”社论指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社论还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全面肯定了上海市造反派的夺权经验，向全国发出了夺权号召，使夺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毛泽东决定派军队“支左”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只在个别地区、个别方面介入过运动，基本上独立于运动之外。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赋予军队以军训的任务。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又赋予军队以军管的任务。

1月23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关于可否派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上写了给林彪的批示。全文如下：“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支左”《决定》还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5）“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个指示被传达到全军官兵。

不久，毛泽东又赋予人民解放军以支农、支工等项任务。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

军”。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稳定混乱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带来消极的后果。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达280万人。

山西省造反派夺权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山西省造反派的夺权。同时全文刊登“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月14日的夺权《通告》。

《通告》指责中共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该指挥部由25个造反组织组成。

在山西省委被夺权以前，江青曾将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召到北京。上海市夺权风暴掀起后，江青嘱咐张闻天同刘格平谈话，要他立即回到山西领导夺权。1月9日，刘格平等5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12日夜间，在刘格平组织下，山西各造反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向中共山西省委发起夺权斗争，占领了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太原市人民政府。13日，刘格平等人公开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了夺权《通告》。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山西省造反派夺权的胜利，“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3月18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对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作出重要规定。因其内容共有八条，也被称为《军委八条》。

这个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议、以林彪口授的七条命令为基础写成的。1月24日晚，徐向前驱车到林彪的住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了军队存在的混乱情况。并提出：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听后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林彪口授，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叶剑英、聂荣臻都赞成这七条命令。随后，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七条命令。后又增加要求干部严格管教子女的一条，七条变成了八条。28日下午，林彪、

徐向前一起到中南海，将八条命令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看后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1)“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罪证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3)“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4)“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5)“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6)“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7)“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8)“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这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成为面向全国的指导性文件。

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省各界群众和驻军10万人在哈尔滨市举行“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在此之前，从1月10日开始，黑龙江省掀起夺权狂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等院校的造反派，联合接管了《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等7个单位，联合组成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委的权。16日，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有23个单位的造反派成立联合总部，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在此基础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31日发表《第一号通告》,宣布:“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通告》号召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顽固堡垒”,“有敢于反夺权者,坚决严加惩处”。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以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头头范正美为“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2月1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表示祝贺。3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范正美任常委。

2 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欢呼贵州省的夺权。社论说:“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欢呼黑龙江省的夺权。社论号召建立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 被苏联军警殴打致伤的中国留欧学生和留学法国、伊拉克的学生乘专机回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机场迎接,并举行欢迎大会。

3日 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等人,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毛泽东还批评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

△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联名给周恩来贴了一张大字报,恳求周恩来注意休息,以便“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叶剑英、陈毅、吴阶平等人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邓颖超在大字报上贴了“补充建议”。4日,周恩来批注:“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王效禹、杨得志、韩金海。同日,发布《第一号通告》,夺取山东省党政财文等项权力。

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

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低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高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

△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地抗议苏联当局指使便衣特务和暴徒闯入中国大使馆,砸坏新闻展览橱窗,殴打中国外交人员的法西斯暴行。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这种抗议。

5日 上海市举行“热烈欢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发表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并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6日 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公告》指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一再冲击军事机关,冲击部队会场,应当受到制裁,如继续冲击,一定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8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地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通知》规定:一切外出串连人员一律于2月20日前返回,各单位的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旅差费。18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重申切实执行2月8日通知》的通知。

10日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就陈伯达、江青突然打倒陶铸问题讲话。他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毛泽东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

△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介绍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

11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指出:“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机关不成立战斗队。

△ 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联合发布《布告》。宣布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主任是牟立善。

△ 北京市各界造反派和群众共10多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抗议苏联领导集团镇压我国留欧学生,组织暴徒冲入中国大使馆,殴打我国外交人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陈毅、江青等出席了集会。

11日和16日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姚文元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江青等人将这次正义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发动了“反击”。

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指出：“群众及其组织，无权对党员进行党纪处分”。“一般党员的党籍处理，应该放在运动后期进行”。禁止随意销毁党籍材料。

△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所谓“全国性组织”，是指少数造反派临时拼凑起来的冠以全国性名称的造反组织。24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根据这个《通告》，逮捕了在京的全国性组织头目40多人。

12日至18日 毛泽东先后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他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的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

13日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李再含、张明、李立。同日，发表《告全省人民书》。14日，贵阳市举行庆祝大会。

15日 毛泽东接见由外交和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17日，中国和毛里塔尼亚联合发表新闻公报。

16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在这些单位中，要不得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

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规定：这类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地党委负责逐步解决。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文艺团体工作人员，一律停止外出串连，到外地串连人员应尽快回到本单位，集中力量彻底闹革命。

△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反对揪斗姚依林、方毅等。周恩来宣布：“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还有财权等，这些权不能夺。”“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不能叫党委靠边站。”

△ 中央军委发出信件，要求四川省造反派遵守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对着军队的通告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撤除对成都军区的包围。造反派不予理会，军区下令抓人。

△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告《当前煤炭生产、供应

情况》。报告指出，当前工业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煤炭生产下降，供应十分紧张，工业生产用煤供应不足，市场销售的煤炭大量超出计划，建议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18日 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报送《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训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19日，毛泽东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指示》。规定：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和“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组成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并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训。

20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贫下中农要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

2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中共中央各机关，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

△ 国防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就美国军用飞机20日和21日入侵中国海南岛西部领空，打死打伤中国渔民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林彪、周恩来出席了成立大会，陈伯达、江青等在会上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告全国红卫兵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是聂元梓，副组长有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人。

23日 青海省军区支左部队面对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强占《青海日报》社并武装威胁解放军的情况采取严厉镇压措施，致使部分红卫兵死伤，其余退出报社。时称“赵永夫事件”。

△ 《人民日报》提前刊登《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提出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党政机关，也要和夺权的省、市一样，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张春

桥、姚文元、王洪文。同日，作出《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决议草案。24日，上海市各界举行庆祝集会。

△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编制、下达1967年搬迁项目计划的通知》。要求，已批准的1967年搬迁项目，按原计划执行，搬迁工作的部署，由迁出迁入双方共同商定。

24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25日至3月18日 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先后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判攻击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26日至3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5月和1967年2月同外宾谈话的主要内容，陈伯达、康生在讲话中集中地诬蔑和攻击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指示。

27日 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并注明“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28日，毛泽东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28日 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作出的《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决议草案，“供各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该决议草案提出，在已经夺权或原来权力就掌握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手中的单位，“要掌好权、用好权”。

贵州省造反派夺权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欢呼贵州省造反派的夺权。同时全文刊登“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月25日的夺权《通告》。

《通告》指责中共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下，17年来忠实地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旨意，在贵州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宣布“自1967年元月25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在贵州省委被夺权以前，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连续向中央发出许多电报，反映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对他颇为赏识，并向毛泽东推荐。1月下旬，李再含到北京，受到江青接见。江青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发表夺权通告，夺取了贵州省和贵阳市的

党政大权。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它再一次证明，“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2月3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十项通令》。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乘胜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夺权以后，在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持下，应很快建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产生，由革命造反派民主推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和监督，候候处理，不许乱说乱动。”

13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李再含，副主任张明。同日，发布《告全省人民书》。14日，贵州省各界群众和驻军10多万人在贵阳市隆重集会，庆祝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在会上讲话，他说：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打碎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旧机器，创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秩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

山东省造反派夺权 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日，发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通告》宣布：“自即日起，前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全部归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废除前山东省委、省人委发布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其中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文件除外。”

在山东省委被夺权以前，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领导夺了青岛市的党政大权。1月17日，王效禹和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来到北京，向康生、王力等汇报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19日，王力对张子石等人说：“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帜不要让人家抢去。”当天夜里，康生、王力、关锋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子石等人，表示“坚决支持”他们在青岛、山东夺权。22日，在王效禹组织下，青岛市23个造反团体夺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宣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并发布夺权《通告》。《通告》声称：“由于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委员会郑重宣告：对山东省委、山东省

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肯定了青岛市造反派的夺权。

山东省造反派夺权后，王效禹出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欢呼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月抗争 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当时被诬称“二月逆流”。

在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站起来质问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动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责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还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无言以对，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会后，陈毅小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在16日下午的会上，周恩来主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张春桥的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在会上，谭震林当面斥责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

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谭震林反驳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余秋里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李先念插话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也说：“我也哭过几次。”谭震林愤怒地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谭震林反驳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还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当即质问康生说：“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都不叫我们看看？”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将会议情况向江青作了汇报。当晚，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合写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纪要，并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7日，谭震林致信林彪说：“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林彪将信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示让周恩来看了这封信。

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陈毅、谭震林等人。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根据毛泽东的提议，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等人。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趁机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潮。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党和国家的大事改由“中央文革碰

头会”讨论决定。

周恩来发表反对夺权的讲话 2月17日和18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财贸系统司长以上干部、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时，先后三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党委的领导，反对打倒老干部，反对夺权。

周恩来要求坚持党委的领导。他明确宣布：“财政业务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财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还有财政权等，这些权不能夺。对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的、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商业部还是姚依林，通缉令取消”；“工交系统，他们那样做法，我们不同意。”“部党委上边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责任还是部长、司局长负”。

周恩来要求保护老干部。他说：“不能说，中央各部都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况且各人所犯错误有轻重的不同”，“也有根本没沾边的”，“一般地说，路线问题检查一下就行了”。“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同志被你们斗了一个月，工作不能进行”，“我很难过，逼得我下命令叫方毅同志休息。”“现在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张霖之的死，我心里不安。”“康世恩、段君毅、王磊等人是我下命令要回来的。怎么能把这么多老干部丢掉！外边有许多标语，都不是中央同意的。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一个也不能扣留。”

周恩来反对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开展斗争。他愤慨地说：“关于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业务耽误了，身体也摧残了。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你们不说什么，我们看了心里不忍。”“现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照出相来，还有什么‘百丑图’，中央看了很不安。”“街上标语是‘砸烂×××狗头’，什么狗头？是人头嘛！”

周恩来在这三次讲话中，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他反对“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做法的基本态度，与谭震林、陈毅等人是一致的。

3月

1日 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介绍贵阳市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的夺权经验。贵阳市棉纺厂1000多名造反派分属于17个组织，在联合夺权以后，提出并实行

“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的原则，按行政部门搞联合。《人民日报》称“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2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主要内容是：地、富、反、坏、右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外，其余一律上交；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的财物，全部退还本人。

△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欢呼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日，山东省济南市各界群众和驻军部队3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3日 毛泽东提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这样，就将军队“支左”的任务扩大了。支左、支农、支工，合称“三支”。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偷越国境进入越南的通知》、《关于劝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自发赴越援越抗美的通知》。

5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越南北方领土实施狂轰滥炸的新的战争升级行为。

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船舶一律不要搞夺权的通知》。

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的师生，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各大院校师生，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组成由革命学生、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

△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中小学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社论说：“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告》，要求各地在春耕期间不要进行夺权斗争，已经夺权并经群众和上级同意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要切实指挥好春耕生产。

△ 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作了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批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8日 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在中央文革小组授意下，率领1000多名学生占领中国农业展览馆，冲击“全国农业学大寨典型展览”，呼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攻击谭震林。

△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应邀来访，周恩来等前往机场迎接。12日，毛泽东会见了威尔科克斯。

9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3月7日社论《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指出：“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要消极地等待别人拉去‘亮相’，要主动‘亮相’。积极向无产阶级革命派靠拢，承认错误，主动交心。”

10日 毛泽东对章士钊3月初关于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的来信予以答复。全信如下：“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支工问题的通知》。

1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在农业、工业、财贸各方面成立“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 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照会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强烈抗议苏联边防部门强行扣留陈列在中国国际列车上的毛主席著作，并殴打中国国际列车乘务人员的暴行。

12日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

△ 经周恩来批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42周年纪念活动。

13日 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规定不准把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印成传单散发和张贴。

14日 毛泽东接见刚果（布）司法和劳工部长弗朗索瓦·马科索和他的夫人。

△ 北京市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

1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薄一波等执行中央决定履行有关手续出狱定为“自首叛变”，造成重大错案。

△ 周恩来接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任驻中国大使哈密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规定：不准私分生产队的公积金、集体储备粮和种籽，不准破坏农具和机器，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节约使用交通工具，对文物、图书加强管理和保护，对盗窃或破坏国家资财者给予处分，并要酌情赔偿。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纸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报纸应接受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的领导；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报社内革命派如不能控制局面，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正常出版，可以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

△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发布的《布告》，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布告》规定：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要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进行；军管会要支持无产阶级左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1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道和在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 北京市“红代会批谭（震林）联络站”等召开有134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学大寨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2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

1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遵守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以外时间，坚持文化革命，要求注意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保证产品的质量。

△ 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附录《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要求各大、中城市参照办理。

△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刘格平，副主任有张日清、刘贯一、陈永贵。19日，山西省各界群众和驻军30万人在太原市集会，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因此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主要内容是：（1）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运动在3月底告一段落，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2）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在整风告一段落后，全部投入这项工作。

△ “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出席，周

恩来在会上讲话。会议通过了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名单。

20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 毛泽东对齐齐哈路铁路局机务段3月12日报告作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

22日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谢富治、江青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会议通过了《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决议》，通过了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名单。

23日 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同日，发布《布告》说：“遵照中共中央3月15日决定，对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宣布流血事件由赵永夫、张晓川负责，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等隔离反省；由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着手筹建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25日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江青出席大会，周恩来、江青讲话。会议发表了《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

2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要求：立即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领导班子，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新安徽》报社。

△ 陈伯达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教学改革问题。他说：“教育制度要搞个大革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演变来的，后来又接受苏修一套东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

28日 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如实反映他没有说过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也没有提倡过当“红色买办”。

29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区都不宜按民族划分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也不要以民族名称命名群众组织”。

30日 《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集中诬蔑和攻击刘少奇。文章诬蔑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经毛泽东

看过，并经毛泽东批准发表。

31日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等人根据戚本禹的怂恿，贴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北京市一些造反组织成立“批陈联络站”。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提倡“三结合” 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欢呼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提倡组成“三结合”的机构。

社论说：“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山东省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正是他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正是他们识破了阶级敌人假夺权的阴谋。在决战的关头，更加显示了他们的伟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山东省革命的领导干部一批一批地挺身而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并肩战斗。革命干部，特别是长期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在最尖锐复杂的斗争日子里，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社论指出：“在两个阶级的大决战中，每个人，每个群众组织，每个干部，都要重新受到严峻的考验。”“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10日，《人民日报》提前发表《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样，是否实现了“三结合”，成为检验各个地方和单位夺权成败的基本标准。

关于“三结合”的权力机构，社论指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后面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上的。此后，各地都建立了“三结合”的“革

命委员会”。

薄一波等 61 人“自首叛变”错案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61 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3 月薄一波等人经过中央批准履行有关手续出狱错案定为“自首叛变”。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张闻天共同作出了“叛变的决定”。“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所谓“自首叛变”的真相是这样的:1936 年,日本侵略军进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缺少能够开展工作的干部,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当局规定的有关手续出狱工作的建议,得到中央代表刘少奇的支持。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此作出决定,并请示了中共中央,张闻天经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商量,批准了这项决定。但是,经中央批准的决定传至狱中时,反省院党支部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作出这种决定,没有执行。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指示后,狱中党员才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这些党员出狱后,积极投身抗日运动,成为各个方面抗日斗争的领导骨干,许多人成为中共中央重要干部。

把经过组织决定履行有关手续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是康生等人制造的重大错案。1966 年 8 月,康生利用红卫兵,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并要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查”。9月16日,康生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看法,11月24日他在代中央起草的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批复。但是,康生等人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并借此打倒刘少奇。1967 年 1 月 10 日,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的部分人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2月3日,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会见卡博、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康生等人在制造薄一波等 61 人“自首叛变”错案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卑劣的手段。他派人对张闻天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

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张闻天坚贞不屈,遭到迫害,被囚禁在一间小屋里长达 523 天。康生还以“中央委员”的头衔等为诱饵,要安子文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也遭到拒绝。薄一波、刘澜涛等人随后都遭到迫害。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等人的材料后,在全国各地刮起了“揪叛徒”的狂潮。林彪、江青等人诬称在全国各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造成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数以万计的人遭到诬陷和迫害。

林彪谈军队“支左”问题 2月20日至3月25日,由周恩来提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研究“三支两军”等问题的,中央文革小组却把它变成了散布打倒刘少奇的种种谬论的会议。3月9日,康生传达了毛泽东 1966 年 5 月和谢胡的谈话和 1967 年 2 月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9日和10日,陈伯达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诬蔑刘少奇、邓小平,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指示。10日,康生讲话,着重批判了刘少奇在发展生产问题上的主张。

3月20日,林彪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林彪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主流、支流的问题,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林彪说:“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干部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

关于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一方面,“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同时,在

思想方面，就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

关于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林彪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不能随便抓人”，“多抓不如少抓好”，“一般地都不要开枪”。

4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指示，发出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24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讲话，同时删去了讲话中“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等内容。

“赵永夫事件”被错误处理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以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赵永夫事件”是造反派组织与保卫报社的部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2月23日，西宁市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在北京到西宁串连的一些学生的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活动，并对报社工作人员进行野蛮毒打，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非法“占领”报社的人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当地驻军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时，这些人竟然以武力相威胁。西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认为，如果任其“占领”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支左部队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领”报社的人向部队开枪挑衅，支左部队进行反击，一些人被当场打死，其他人退出报社。流血事件的经过，青海省军区向林彪和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报告。叶剑英在听了赵永夫的电话汇报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24日，在西宁的街头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这里，“叶”被误写成了“林”。

中央文革小组对“赵永夫事件”最初表示沉默，几

天后在《简报》上刊登了红卫兵来信。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调查流血事件。3月11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间，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受害者”的两次哭诉，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王昭隔离反省；向群众公开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流血事件由赵永夫、张晓川负责；抚恤死难的革命群众，释放被捕的干部和群众；刘贤权全权负责青海事件，并着手筹建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4月

1日 中共中央转发3月27日《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并规定：（1）“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2）“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3）“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4）“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字报、开大会请罪”；（5）军队支左“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5期刊登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北京市和全国各地随即掀起批判《清宫秘史》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

1日至3日 中共中央召开解决四川宜宾问题的会议。会议由江青、康生等人操纵，只许刘结挺、张西挺一方“控诉”，不准对立方申辩。会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给刘结挺等人平反的通知》。

2日 在北京街头，造反派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大标语。叶剑英的家被抄。

3日 《人民日报》发表首都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李冬民的文章，号召“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修养》”，“给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敲起丧钟”，“直捣中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

4日 江青在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红卫兵时诬蔑刘少奇。她说：“刘少奇从1945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开始，就提出了一整套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主张）”。

5日 彭小蒙给毛泽东写血书，要求释放“联动”成员，血书经汪东兴转呈给毛泽东。

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保护各种造反组织。规定：对群众组织，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